

元代漢人之保種存文活動

孫 克 寬

前 言

前因有赴韓講學機會，曾擬就元代漢文化問題，撰稿介紹。旋因故中止，此稿存篋，茲特檢出，交本刊以充篇幅。關於元代漢文化的問題，共分爲三個段落：

- (一)北方漢軍大將的保種存文。
- (二)蒙古汗庭儒學人物的傳衍儒學。
- (三)新道教的建立和對漢文化的貢獻。

一、北方大將之保種存文

(一)蒙古人震撼了北亞洲

當公元十三世紀的初期，在北亞洲貝加爾湖傍註(一)，有一個小小的東胡部族，出了一位蓋世的英雄人物。他先團結了分裂的內部宗族註(二)，而後蠶食了周遭強大的蠻族註(三)，便在斡難河上建號註(四)，四征不庭，蹂躪了北亞洲進至於亞洲腹部，獵取了文化悠久，經濟繁盛，人口衆多的中國中原註(五)。復自東北跨越了鴨綠江，壓迫了整個的朝鮮半島註(六)，於是當時的高麗王王朝，也在他鐵騎踐踏之下，和北中國同其命運。這就是蒙古部族與成吉思汗崛起的經過。

蒙古人起自草原，沒有文字，沒有曆朔，純粹是「以殺戮爲耕稼」，但却有一個嚴密的軍事組織註(七)，在天才的軍事領袖領導下，所向無敵，所過之地，如有抵抗，便全部屠殺註(八)，毀滅了敵人的一切文明。可是中國的漢人和他們傳統文化一儒家的禮樂文章，却依然被保存而傳衍下去。這是奇蹟嗎？不，是當時的被俘虜管制的漢人們，苦心孤詣，忍辱負重所爭取，保持下來，這就是本人這個講題的內容。至於蒙古部族的形式，與他那些征伐的經過，乃至成吉思汗本身的豐功偉績，當讓諸一般的史學研究。

本人於一九五三年起，開始研究蒙元時期漢文化之活動史實註(九)，曾寫元初儒學，把此時期的儒學流衍，割分成三個時期註(十)：第一期是蒙古人入中原初與中國的儒生接觸，在朝的以耶律楚材爲中心，輸進儒治的觀念；在野的以元好問爲中心，鼓吹漢軍將帥，保存儒學，自身則結交同道，汲引人才。自此以後，元世祖忽必烈開府金蓮川註(十一)，大量引用儒學人物，成功了後來的中統至元的儒治局面。當這個初步研究完成，我纔發現那時期對地方人民

的保護與漢文化的貢獻中，還有那些漢軍將帥與道教的道士。如所周知的丘長春雪山講道，其影響成吉思汗接受對漢文化的觀念，功效尤大過於後來那些儒臣們註(㉑)。於是轉而研究漢軍問題，新道教問題。此次講演用意就在這一個前提下，對這三方面的貢獻，略加評價。

註(一)：據馮承鈞譯多桑史第一卷一章，洪鈞著元史譯文證補諸書，見拙著元代漢文化之活動三頁註(一)

註(二)：見拙著元代漢文化第九頁註二、註四。

註(三)：見前書八頁註一。

註(四)：見前書十頁註(四)，另參考柯紹忞氏新元史太祖本紀。

註(五)：時在一二二一年，(辛未金衛紹王大安三年)詳見元史新元史太祖本紀及馮成鈞著成吉思汗傳(商務版)。

註(六)：蒙古之與高麗接觸，據新元史高麗傳始太祖之十一年，契丹降人叛蒙渡鴨綠江，後來如三浦鮮萬奴叛金僭號大真，遼東大亂，太祖十三年遣兵入遼，十四年遣使詣高麗，此據中國史，當與韓國史記會勘之。(日人箭內互蒙古侵略高麗考詳考之)

註(七)：見元代漢文化六至十九頁(蒙古之軍事組織)。

註(八)：見前書二十六頁至廿八頁(蒙古初期年事之恐怖政策。)

註(九)：參考元代漢文化之活動自序。

註(十)：(一)儒學接觸時期，(二)儒學表現時期，(三)儒學崇重時期，均見前書一三九頁至三〇八頁。

註(十一)：金蓮川在開平附近，憲宗蒙哥汗，忽必烈以皇太弟綜理漢地政事，用劉秉忠、竇默、張文謙、姚樞等招引中原老儒討論漢法，今人因名此為金蓮川幕府。

註(十二)：丘氏事蹟詳具姚從吾教授著丘處機年譜(收入東北史論叢一臺北正中版)後當述之。

二、北方漢軍之「保種存文」

現在先談蒙古治下的漢軍大將所做的貢獻：

(1)何謂漢軍？那是蒙古人軍事組織中的一個兵種，當時編組時，原不盡是漢人，大概契丹人、女真人，以及在北方的漢人皆屬於此。元史兵志卷九八

「既平中原，發民為卒，是謂漢軍……其既得宋兵，號曰新附兵」。

那時北方的民戶，女真、契丹，都和漢人雜處註(十三)，所以它的份子不能盡是漢人。可是漢軍的編組，實即降附的金人部隊與地方武力，首領既是漢人，仍然以漢人占大部份。本人曾加以分析，並列表說明註(十四)這些漢軍將領，初起來都是民兵首領、保衛鄉土，對固有的文化，亦受薰陶。雖在異族之下供其馳驅，但保全其種族及其文明，他們會自覺地做起，再加上知識分子的影響，更會有系統地去做。

漢軍人物很多，其中降附最先又擁有較廣大的藩地的，以東平的嚴實(長清人，卒於太宗十三年，年五十九)，河北的史天澤(卒於元世祖至元十二年，年七十四)、張柔(定興人，卒於元世祖至元五年，年七十九)和董俊(棗城人，太宗四年陣亡年四十八)父子為最有名。他們都是起自民兵，在防地裏保全民命，建設文化，都有成績。他們的後代，除嚴氏外，都世代掌兵從政，幾乎與國同休。本人寫有東平興學考，是記述東平嚴氏的興學之功，又撰漢軍三世家考，是史、張、董三家的文化活動的記實。(皆收入元代漢文化之活動)

(2)漢軍藩地：蒙古人的慣例，凡是軍前降附，即依原來的官職封之，防地也大多是依其固有的領區。漢軍的防地，大約都在河北山東一帶，永清史氏，創業人物為史天倪、天澤兄弟，原以民兵保衛鄉里註(十五)木華黎註(十六)國王大兵來時由他的父親史秉直領其子弟親族投降，

隨軍征討。史天倪兄弟即鎮戍真定一帶戰守其地。定興張氏，創業人物是張柔，原也起自民兵而為金軍統帥，張柔在紫荆關戰敗而投降，便鎮戍保定滿城一帶。稟城董氏，更是農兵出身，第一代董俊僅止於偏裨身分，在史氏轄區防守，第二代才以侍從貴顯，沒有固定的防地，可是在世祖初期，却掌領侍衛親軍。這就是河北漢軍三世家的創建經過。在此以前，有山後劉柏林註(㉔)為初封三萬戶之一。山東方面以東平嚴實防區最大，濟南張榮，與嚴氏相犄角，但在世祖初年撤藩議起註(㉕)，他們都解甲歸朝了。此外投降最後，傳世最長久的鞏昌汪氏註(㉖)，第一代汪世顯本是金軍統將，因為用兵南宋的關係，始終在川甘邊區鎮戍，與中原的局勢無關。本人曾寫有「漢軍份子的分析」與「元代漢軍人物表」，可以參閱，不必再細說了。

註(㉔)：金世宗時採強硬的移民政策，強括民地，隸猛安謀克，見金史食貨志，拙著「金之崩潰」述之。
。元代漢文化三九頁。

註(㉕)：載拙著蒙古漢軍與漢文化東海大學出版六~十頁，又元代漢文化之活動二三七一~二四九頁。

註(㉖)：史氏之先，有清澗社。見元史本傳。

註(㉗)：參註六，元代漢文化之活動四十七頁「木華黎之招降略地」。木華黎為成吉思汗四傑之一。

註(㉘)：劉柏林，與子劉黑馬(巖)。本傳在元史144卷。

註(㉙)：見元文類卷58頁王磐右丞相史公神道碑「李璫變後……」漢軍改封自李璫變始。

註(㉚)：汪世顯於太宗甲午年據鞏昌，降於皇子闊端，世鎮西陲，至明初始亡。元史新元史均有傳。

(3)他們的貢獻

漢軍人物的功罪，我曾有論述註(㉛)：在罪的方面，認為他們不能團結在北方的漢軍各區將領與南宋北伐之師聯合一氣；而甘為新朝鷹犬，替他戍守真空地帶，以待中統至元間的統一。功的方面，認為他們能保全中國士大夫，延續儒學命脈，在防地裏保全民命，稍甦元氣。平心論之，蒙古當時的軍威，實在是無可抗拒。能保存一線的漢文化，和保障孑遺的民命，他們也算盡到人類愛護同類的責任了。

在漢軍中，對地方的保全，以史氏、董氏為最，文化的延續，以東平嚴氏，稟城董氏為最，張柔雖係武夫，但能庇護大儒元好問，收存金史，興復保定一帶的城鎮建設，其功亦大。董氏二代，沐浴儒學，接納南方儒士，開元代二期儒治，尤為彬彬有禮，現分兩方面略加說明：

(一)恢復地方秩序，這裏有以下幾點：

- A. 重建廢墟：如史天澤重建真定城市，張柔重建順天城市註(㉜)。
- B. 減輕百姓擔負：如史天澤在真定奏請，減輕羊羔兒利息註(㉝)，董氏在稟城代償民租註(㉞)。
- C. 勸種農桑，如董俊之在稟城重視農耕註(㉟)。

我所讀過元人文集中關於漢軍將領傳志，都有贖還俘虜，代償租稅與勸農愛民的記載，不及一一說明。

(二)保全漢文化，此點亦有幾方面：

- A. 接納儒士，如嚴實在東平，延聘名儒考試學子，史氏在真定之賓禮名儒，張柔入汴保護金朝諸名士北渡。董氏三代都尊崇儒士，保護士類，把他的故鄉建設為一道學聖地。

- B. 興復孔廟，真定與東平聖廟之修復，元好問，李冶這些大儒，皆有文章記載。元人文集學記最多，皆由於兵燹之後，興復孔廟，為漢文化之象徵註(四)。
- C. 保全文物：如張柔入汴，保全金實錄，董文炳入臨安，保全宋歷朝史籍圖書。

註(四)：見蒙古漢軍與漢文化八十九頁漢軍份子的分析。

註(五)：見元代漢軍三世家考史氏本末原書二五四頁引王惲史忠武家傳，及同文張柔行實考原書二七八頁引元遺山「順天萬戶張公勳德第二碑」。

註(六)：見前書史氏部分原書二七八頁。

註(七)：見前書董氏部分原書三〇五頁。

註(八)：見前書董氏部分三二二頁。

註(九)：見東平興考。

註(十)：見前書東平興學考及董氏本末中餘論節三二七一三三〇頁。元文類一書所收此類文字甚多。

× × × × × × ×

由以上簡略的分析，可以看出在蒙古軍鋒之下，中原人民和他們悠久的文化，實面臨覆滅的命運。只有這些為敵人充任戍守、斥候的附屬兵種，由漢人統率。由於他們的掩護，才能稍延喘息，把才遺的民命與文化的種子保存下來，等待秩序大定之後，再次抬頭。他們的「附敵」行為，固然是民族罪人；可是憑藉這些貢獻，史家也不得不對他們稍加寬恕了。

三、在蒙古汗庭的儒學人物——

此題也打算分三段來說：

- (一) 儒學的韌性精神與其傳衍
- (二) 傳衍儒學的三個關鍵人物
- (三) 蒙元的儒治與儒學鳥瞰

中韓兩國都是深受儒學浸漬的民族，中國歷史記載箕子是開發朝鮮半島文化的主導，以八條教民見漢書後漢魏志那些條教，都是殷周以來傳統的教令，所以風俗淳良，有「君子國」之稱，這是儒學精神之所表現。儒這個字，始見於論語：「汝為君子儒，毋為小人儒，周禮一書更記儒的性質、使命：是以「六藝教民」，以「善道化民」。它的本來意義，雖有柔儒之義，可是為孔子注入了新生命，君子儒就是「邦有道不變塞焉」（中庸）的人，中庸一書，實在是「儒道」的最高表現，中國儒生秉承了中庸的精神，守著六藝的孔子之教，歷代雖遭遇了危亡喪亂，總是抱著儒書，發明聖道，來守今待後；而我中華文化也因之而保存延續下去。如秦始皇焚滅經書，孔氏的子孫孔鮒便把書藏起來，清儒王夫之讀通鑑論卷一盛加贊美說：「能為無用之學，以廣其心，而遊於亂世，非聖人之徒而能若是乎？」同時伏生也保存經學，到了漢景帝時才把今文尚書授於當世，開一代經學之風氣。其他像王通在隋末的河汾講學，造就了唐代貞觀的許多儒臣，明末黃宗羲、顧炎武諸人的窮經著作，開清代乾嘉的漢學，培養中華國民革命的種子，都是很明顯的事例。本人在抗戰時曾撰寫「中華民族的韌性精神」即發揮這種道理。

蒙元時代的儒生，他們的遭遇更慘烈了。擺在他們面前的並不是個人的榮辱存亡，而是整個民族與文化的覆滅與存在。蒙古人破城以後，即全部屠戮，贖下的人民便虜俘爲奴，無貴無賤，遑論儒生。這其間必須有人打動汗庭，讓大汗、貴族們，知道儒生的用處與中國禮樂制度的價值，所以不惜「屈身以行道」。元儒姚燧所撰「江漢先生事實」，記他的伯父姚樞對南宋大儒趙復說：「徒死無義！」（當時趙在德安被俘）於是趙氏隨之北來，傳播南方朱子之學，版印四書五經，「北方經學，實賴倡之。」（原文），可見當時儒生們用心之苦。本人舊撰元初儒學現收元代漢文化活動中曾分蒙元儒學爲三個時期，以初期儒生境處爲最難，二期儒生的貢獻最大，到第三期已是漢化大行，不過是堅定宋儒的道統而已。

在這種滔天橫流之中，有三個了不起的人物，我目之爲「關鍵人物」。其一是契丹人耶律楚材，沒有他不能保全漢地，庇護儒生；其二是詩人元好問，沒有他不能鼓吹儒化，說動漢軍藩帥做復興文化的工作；第三是僧侶反俗的劉秉忠，沒有他不能教育大汗開啓元世祖一朝的儒治。三人出處事功，在下節敘述。

（二）傳衍儒學的三個人物

在未敘述這三位人物事功之前，當先了解蒙元儒生的特質。他們與前代儒生不同。前代的儒生只是重視講學與自修，所講的非性道即文章；而他們則重在用世，因此學之外還要重視技藝。本人在「北方之儒」文收元代漢文化內提過：

「元代北方之儒，其學術精神，亦有其獨特之點；那就是富於救世與用世的精神。所學也多注意於經世實用之學；人倫間則重視禮經的典範，出用於朝庭，則以天文律歷或者典章制度有所表現。」

現在我的觀點仍未改變。本此觀點來看這三位救世行道的大人物。

（1）耶律楚材：耶律楚材是遼東丹王突欲的八世孫，字晉卿，別號湛然居士。生於金章宗明昌元年（公元一一九〇）卒於蒙古乃馬真皇后攝政時期（公元一二四三），他在貞祐初（一二一四年）燕京被蒙古兵攻陷時，成吉思汗召見，問以治國之道，他用很通俗的話說「製造弓要好的匠人，治理國家難道不要用好宰相吧？」這樣便打動成吉思汗，收置左右，隨軍西征，邀得信任。太宗窩闊台即位，更見信任，官至中書令。他建議不屠殺攻下的汴梁城，訪求有學問的儒士，設置十路徵課使來征收稅捐，供給軍國之用，免得蒙古親王們要把中原之地改作牧場。蒙古的漢化，都是自耶律氏當國開其端。宋子貞，東平學士至元儒臣撰他的神道碑，說他「贊經綸於草昧之初，一制度於安寧之際」，真是定評。他的傳在元史一四六卷，著作有湛然居士集與西行錄。這位華化了的契丹貴族，治事做人，都有中國史上的名臣風度，有他一人在汗庭，所以亡金的士大夫，纔有了棲身之所。他在文化上最大的貢獻就是設置燕京、平陽兩個經籍所，以名儒主持編印經籍。又在十路徵課所轄區裏舉行科考，考中的儒生，可免簽丁徭役，「儒戶」這個名詞由此成立，漢文化纔有傳播的人與傳播的機會。關於他的生平，近代研究的著作，以王國維耶律文正年譜爲最有名。

（2）元好問：元好問，字裕之，自號遺山，是金源儒家，山西秀容人（太原），爲拓拔魏的後裔，傳附金史元德秀傳中，他是金元之際最大的詩人，集名遺山集。他原任南金翰林侍從，困在汴梁圍城中，蒙古兵破汴之後，俘係北渡，受到漢軍大將張柔的照應，他也勸導張柔，保全金寶錄免於兵火。那時耶律楚材在窩闊台汗身傍，建議保全儒學的事，即受元氏上書的影響。（他集中有癸己上耶律中書，列薦人才五十四人。皆當世儒行文才兼著的人才）

他北渡以後，先後游說漢軍藩帥，為東平嚴實，主持科試，開東平講學的規模。後又與李冶（洽）張德輝共居真定的封龍山中，講學論文，安排興復儒學的大計，促進後來元世祖用儒的局面。他建野史亭撰王辰編，為後來修金史的主要資料。又編一部中州詩集，蒐羅金代詩篇，並且記錄這些兵火中詩人的事跡，為研究金史與詩學的必讀之書。他生於金章宗明昌元年（西一一九〇）恰與耶律同庚，卒於蒙古憲宗末年（西一二五八）正是元世祖即位之前二年。他一身開蒙古接觸儒學之機運，實在是一個關鍵人物。臺大姚從吾教授有「元好問對於保全中原傳統文化的貢獻」論文，分析他的事功，最為詳備。本人所撰東平與學考，與元初儒學均曾討論到他。他的生平大節，他的弟子郝經所撰墓志說：

「方吾道壞爛，先生獨能挽而救之，揭光於天，俾學者歸仰。識詩文之正，而傳其正脈，繫而不絕，其有功有世又大也。」

金史文藝傳元氏傳論說：

「兵後故老皆盡，好問蔚為一代宗工……晚年尤以著作自任，國亡史作，己所當任。」足以見同一時代人對他的推挹。

(3)劉秉忠：本人研究蒙元的漢文化，以漠北四朝（太祖、太宗、定宗、憲宗），為接觸時期；而元世祖開平建都，改國號建元以後，為儒學表現時期。元世祖忽必烈，在做皇太弟時即有志於以漢法治漢地，這是什麼人的影響呢？那就是一位僧侶子聰後復姓名為劉秉忠的人物所造成。他是元初一位神秘人物，做過小吏，做過道士，又改投僧侶，後又還俗官至中書太保的相位。他是河北邢州人（今邢台）生於金宣宗貞祐四年（西一二一六），卒於元世祖至元十一年（西一二七四）傳在元書57卷，中統至元的儒臣領袖。凡是元代的建都、朝儀、鈔法、以及其他的大制度，都出於他的手筆。他的著作不多，僅有藏春集一種，只是些淺近的詩詞。邢州是世祖的封地，他少隨海雲和尚入和林，因而隨侍藩邸。那時他已是飽學之士，曾上書給忽必烈，論行漢法之利，後來金蓮川幕府的組織，吸引漢地耆儒文士，使儒臣張文謙、竇默、乃至姚樞、許衡的進用，大多直接地間接地出於他的推薦。他很熟習陰陽五行之學，所以在後來留下許多神秘事跡記載如陶宗儀輯耕錄或如梓老學叢談所記本人舊寫「元代神秘人物劉秉忠及其藏春集」一文現收蒙古漢軍，曾將他生平特點略加鉤勒。我的朋友袁國藩先生，也撰有劉秉忠年譜，載於臺北大陸雜誌，是較為重要的文獻。何以他能影響世祖呢？因為蒙古人崇尚釋道，大汗左近，例有這類人物隨侍，進言方便，影響作用也就大了。

(三)蒙元儒治與儒學鳥瞰

由上面的敘述，我們不免要問蒙元時代儒生的「屈己行道」，他們最終的目的是什麼？在這裏可以兩言答復，「傳衍儒學與施行漢法。」關於前者，在初期的儒學，意義較為廣泛，不過中國儒家所傳的禮樂文章與漢唐以來的詞賦詩文而已。但到後來姚樞許衡晉用，一意地傳播南方朱子一派的理學，其範圍便只限於經義、道學了。至於第二點的漢法，以郝經、劉秉忠、許衡等人所建議的最為明白。劉秉忠在世祖為皇太弟時自邢州還，即上書陳述治中國當用堯舜三王以來的「典章禮樂法度」與「三綱五常」，開首一段，便這樣地說：見本傳

「典章禮樂法度，三綱五常之教，備於堯舜，三王因之，五霸敗之；漢興以來，至於五代一千三百餘年。由此道者，漢文景、光武、唐太宗、玄宗五君，而玄宗不無疵也……。」用中國歷史興亡的公例來打動這位英主的雄心，此文綱舉目張，後來中統至元政治的規模，都沒有踰越所建議的範圍。郝經在中統元年進立政議元文類卷十四慷慨激昂地陳歷代治

亂大要，主張「以國朝之成法，援唐宋之故典，遼金之遺制，」又說：

「昔元魏始有代地，便參用漢法，至孝文遷都洛陽，一以漢法爲政……」

又說：

「今有漢唐之地而加大，有漢唐之民而加多，雖不能爲漢唐，爲元魏金元之治亦可也。」

像兩人所說的用漢法，凡是元初儒臣的傳記裏，都載有類似這種主張，至於許衡在至元時期登朝所進的時務五事，立國規模一條，更堅決提出「非用漢法不宜也！」而世祖也就一一採用了。所以世祖時代的儒治大端，在學校立御史台，設大司農，都是漢法的根本之圖。我們今天讀那些儒臣們的奏議，和唐宋君臣的氣象都差不多，可見那時儒治的規模了。

關於儒學的傳衍，姑以黃黎洲宋元學案所記爲準，來劃分南北兩派。記述北方儒學的有 A. 魯齋學案（許衡）與靜修學案（劉因），記述南方儒學重要的有 A. 北山四先生學案（金履祥、許謙等） B. 草廬學案（吳澄等）本人曾撰有元代北方之儒及南方之儒試論，曾略加評述，此處不能多說。

就元代南北儒學的風格來衡量；大概北方之學，行於太行山區（今河北河南）與關中（今陝西）一帶，所學在經濟實用，所重則人倫修省，較爲篤實。許衡一脈，尤其是涇涇自守，樸實無華。但一代學制是許氏創建，不惟使中國的讀書人有講修與生活的寄托，且使蒙古、色目人讀華書、受漢化，造就不少的儒者，如不忽木，字求魯翬之流。南方之學，有朱陸兩派。金華一帶，自金履祥以降，篤守朱子之書，而且重視春秋經世之學，發揮民族大義，也保存趙宋一代典章學術，後來明祖建國，儒臣的領袖宋濂即是金氏再傳門人，對光復漢家的大業，貢獻不少。至江右一派，以吳澄爲首，講學大旨近於陸九淵，但也重視經義文辭，這一派似乎與元朝統治階層關係較密。元代二期儒治（仁宗延祐）的重要人物程鉅夫，即江右之人，他贊助復行科學，規定以經義爲考試科目，用朱子五經傳注爲標準，一直到了明清兩代，造成中國「八股文」的風氣，其功罪似乎很難判定。

總之，蒙元時代儒學，雖從極艱危之時撐住下來，可也創造了後來六七百年儒學獨占的局面，這是漢民族在大劫中血與淚的成果。

四、元代新道教

這是近代中國的元史研究者突感興趣的問題，——新道教的建立與對漢文化的貢獻。

本段也分以下幾方面：

- (一)略談中國道教流派，演變，與北方新道教建立的背景。
- (二)全真教之傳衍與其他新教之崛起。
- (三)天師教之重興教化。
- (四)元代道教之特質——結論。

不過限於時間，每一子題，只能談一個線索，本人著有宋元道教之發展上下兩冊，與姚從吾先生所著之丘處機年譜，可供詳細地披閱。

(一)道教流派，演變、與新道教的背景。

道教，是中國古代的傳統宗教，她的流派很多，正式建立是在東漢末年，（即所謂五斗米教，和天師教），可是隨時代而演變，隨時有新的宗派產生。大抵自道衆的階層分劃，有

平民的，士大夫的兩派。前者以龍虎山張天師爲代表，以符籙齋醮爲本業，中國人稱之爲符籙派。後者山林隱居、鍊丹、導引（靜坐）學習長生之道，由東晉著枹朴子的葛洪起，到齊梁之間的陶弘景，創建了茅山宗派，到李唐而大興；他們都講研哲理，擅長文學，受到宮廷與朝貴們的尊崇，中國人稱之爲丹鼎派。另外一派，也以齋醮上章，求福消災爲主旨，却反對天師道「惑民」，創自北魏的寇謙之，唐末杜光庭興於前蜀，北宋林靈素顯用於徽宗崇觀時期，中國人叫她做科醮派。這些宗派。我們統謂之爲舊道教。

道教都奉老子（李耳或老聃）爲主，天師教的創始者張道陵，逃避世亂，流徙巴漢（今陝西漢中與四川川北一帶）結合當地的巫鬼迷信，襲取了「黃巾賊」（太平道）的太平經，以及秦漢以來的陰陽五行的方術與巫覡的祭典習俗，而創建五斗米道，自號天師。其子孫張衡、張魯稱爲嗣師，各地方設有「治所」，後來盛行於交廣與東南沿海（用陳寅恪之說）傳到東晉，流寇孫恩、盧循即憑藉這種宗教信仰吸引民衆而起事造亂。由於此教以驅鬼、治病爲號召，所以在下層民衆間，易於流傳。可是南北朝至於隋唐，天師教只在若隱若現之間，到了北宋纔正式加封龍虎山的張天師，以後世俗相傳，公然認爲天師是道教領袖了。

丹鼎一派，葛、陶都是文人，著作流播古今，他們復活了秦漢的方士們鍊丹求仙的思想，也是中國最古老的仙道升遐思想的承襲者，再加之老莊玄旨的演繹，與楚辭、漢賦文學的粉飾，而使宮廷崇重，士大夫傾心，極盛於以道教爲國教的唐代，宋代茅山宗師依然受到朝野的供奉。至科教一派，已混合於兩派之中，成爲道士們的專業了。

道教的理論，多出於老子道德經、莊子南華經與及東晉僞著的列子，這三部書，被道士們輾轉訓釋，烘托假借，蒙上了重重地神秘色彩，在道藏中不知有多少種書。魏晉南北朝間，受佛教的影響，出現了上清、靈寶兩系的道經，漸漸構成「三洞、四輔」的經典叢書。唐宋兩朝道藏，其中也保存了若干種諸子之書與後人的方技著作，可反映中國文化的浩瀚廣大。

道教在北宋兩度被尊崇，尤其是徽宗趙佶崇信到了極點，他自號道君皇帝，把佛教納於道教之下。各地方遍建道觀，大興土木，撰述經典，編造道史，弄得烏烟瘴氣，促成了大崩潰的來臨，可也造成北宋代末期社會上普遍崇道的風氣。雖然是金人入侵，北方陷入異族統治，但薪盡火傳，民間以「入道」爲避亂藏身，與保全文化命脈的途徑，因而有河北新道教的出現，這是元代新道教的背景。（此節請參閱拙著宋元道教之發展上册導論，與下册正一教考）。

（二）全真教的傳衍與其貢獻

北方新道教的興起，是在金熙宗一世宗時期，（約西一一五五——一一六一）對道教來說，那是一種革命。新道教以全真教爲首，乃至太一教、真太教（註）多以救世化民爲教旨，對自身則以玄修自守，刻苦身心，接納了大量的知識份子，提高了宗教品質，所以金末大亂，便挺身而出，捨救子遺的民命，掩護儒生，保存經籍來延續漢文化的命脈。

全真教創自陝西人王中孚，後改王嘉，道號重陽，一位兼具英雄氣質與宗教悲憫熱情的偉大人物。他起自關中，中年悟道，經過多少年的「苦修行」，一旦豁然大悟，把庵子燒毀，說去東方「往丘譚捉馬」，就乞食到山東省登萊一帶，渡化了馬鈺、譚處端、劉處玄、丘處機、王處一、郝大通、及郝妻孫不二，遂糅和儒門的心性、佛家的禪淨兩宗與道家的老莊，而粉飾神仙長生之說，創建了「三教一致」的全真教。在登萊一帶建了幾處法會，多以三

教做標幟，又率弟子西返，而死在汴梁旅舍。傳法於馬鈺，後號丹陽真人，他與譚丘諸人號為全真七真。在金世宗、章宗時代、道法大行、劉處玄、王處一、和丘處機都很受宮廷的禮遇。

丘處機首創入元的全真教，這更是集教主、英雄、儒者於一身的人物。他在金末，高臥山東嶗山，成吉思汗晚年頓兵西域，聽到他的道名，派宣差劉仲祿延聘他來西域講論長生之道。他以七十之高齡，帶門下高弟十二人，跋涉關山，到雪山（西史謂為巴魯灣）覬見大汗，告以道家清淨無為，敬天戒殺的粗淺道理，却打動了這位蓋世英雄，呼之為丘神仙，賜詔勅和虎頭牌讓他在兵間招進散亡的徒眾，修葺道觀。關於丘氏西行經過，他的門徒撰了一部長春真人西遊記，成為中亞交通史上的重要資料。丘氏回到中原，便在燕京建長春觀，也就是今天北平城南的白雲觀，元憲宗時他的弟子李真常奉詔管理天下道教，全真道眾滿天下，儼然超越傳統的天師教而後來居上了。由於全真教最盛行，掩護亡金士大夫，文人學士為全真寺觀所撰的碑版文字最多，全真教的史料最為完備。今天中日學者研究此教而有成果的著作也很多，如陳援氏的「南宋山東河北新道教考」，與姚從吾氏的「丘處機年譜」，最近日本窪德忠博士也有多種研究論文出版。

全真之外為太一教，創於金天眷中道士蕭才珍，傳太一三元法籙，似乎是道教的科教一派。可是四傳到金末元初，在河北衛輝一帶，救人傳道，被漢軍大帥史氏薦入汗廷有文人王暉為撰碑傳，宣揚教旨，元世祖很尊崇此教，也就能與全真教抗衡一席了。至於真大教以「苦節危行」為教旨，道士們不務聲名，憲宗時代有鄺希誠住燕京之天壽宮，纔賜名為真大道，傳播不廣，却甚受南方儒者虞集、吳澄的重視。以上所說的三教，都有傳載在元史釋老傳中。在元代大文人的文集裏，為道士所撰的碑志文章也很多，本人所撰「元代道教之重要文獻」曾采錄若干重要的文字可資參考。

(三) 天師教之重興教化

天師教傳到了元代，官式稱謂是「正一教」，元史釋老傳（卷一〇二）道教正一天師條說：

正一天師者，始自漢張道陵相傳至三十六代宗演。」

張宗演是入元的第一代。前面講過，天師教至北宋纔盛，在徽宗時有三十六代天師張繼先，與道士林靈素，張虛白等同受宮廷尊禮，傳出了許多的神話，還被小說家渲染擴大，水滸傳開首洪太尉龍虎山放妖魔的故事，即以他為主題。到了南宋，由於行都接近龍虎山，天師與茅山宗師，同為道門領袖。在元世祖兵下鄂洲（武昌）時候，曾與南方道士們有所接觸。聞張宗演之父張可大的道價，也許興起了效法成吉思汗迎致丘長春的故事，在平江南之後，就對張宗演大崇封號。命他管理江南道教，於是天師教就以正一教的新面目，重興教化了。

但天師道法之弘揚，還賴於張宗演弟子張留孫與其徒吳全節兩人，元史也有附傳在正一教下。張氏是一位熟習道教經典而又有深遠見識的人，留居汗庭，以祈雨、療病得到宮廷的信任，幾乎代替天師的名位，但他堅持不受，才受封為玄教大宗師，駐在燕京上都，事實上管理南方道教事務。他的弟子吳全節更是一位熟讀儒書，愛好文學，並富有俠氣的人物。他大開玄門，和江南來的士大夫相交，作為宮廷與江南儒學之士間的橋梁，像袁桷、虞集、吳澄，乃至他們以下的人，都深受玄教宗師的庇蔭。在他們文集中，留下若干篇鴻篇鉅製的碑版文字。那時江南的有名道場，如句容的茅山、杭州的大滌山洞霄宮、江西的西山、廬山

、闕皂、玉笥、乃至湖北武當、成都青城，這些古來的洞天福地的道場，都興復得美輪美奐，多少南宋遺民也獲得了方外的收容而嘯傲煙霞（如鄧牧在洞霄宮爲道士）。同時與程鉅夫江南訪賢相呼應，在朝廷與理學大師吳澄共倡陸九淵之學，與虞集倡和詩史，使元代二期儒治，彬彬稱盛。一切道門行政，都操於玄教宗師之手，天師不過深居龍虎山做一個精神的領袖而已。明王禕青巖叢錄說：

「今天師又有天師宗師分掌南北教焉。」可以參證玄教當時的聲光。

本人所撰正一教三考關於天師與玄教的事蹟，鉤稽頗多，可以參考，現在不多講了。

(四) 元代道教的特質

從以上的簡單分析，可以看出元代道教的特質與前代的實有不同。前代道教是純宗教的，在上層以鍊丹服食，款動宮廷朝貴；在下的以符籙齋醮，愚惑人民；偶而出來幾位有學問，有道術的道士們，也不過提高道價，招致道衆而已。只有蒙元時代的道教，却真正地 and 民族生命，實際社會生活聯接起來。北方的新道教，原爲著救民而起，在兵火中也確實搶救了不少的生靈性命與文化遺產；即南方的正一教，也善盡了維護宗邦文物，幫助儒學的發展。在這時期南北道教的領導人物，不止是教主，也是學人，我們讀那時的宮觀碑誌，文學氣味，非常濃厚，可算是道教的復興。歸納起來，他的特質，可得以下幾點：

(1) 北方新道教，爲保種存文而創建，其中教旨，不純然爲道教傳統，如全真教已是三教合一之論。

(2) 他們多與漢人的文士結合，打入宮廷，掩護漢人的政治地位。

(3) 南方道教，特富於文學藝術色彩。

(4) 三教合一觀念，藉道教掩護，導致其他後來迷信結社之出現（如彌勒教、白蓮教等都以蓮花爲標幟，與全真以「金蓮」表記相類）。

(5) 研究元代漢文化史，道教文獻不失爲主要的參考資料。

元代漢人之保種存文活動提要

本文，原應韓國基督教大學之邀打算做的三次講演稿，嗣因故不能前往，故發表於本學報，爲初學元史諸生，做常識的介紹。

蒙古人於公元十三世紀初挺起北亞洲貝加爾湖畔，以一小部落而南進中原，西畧大食，橫掃當時的世界，建立大帝國，兵鋒所及，殺戮極慘，中國漢人面臨死亡與文化滅絕的危險，有志之士，不能不作保種存文的打算。於是降附蒙元的漢軍將領，在兵間苟活的儒生、和本地宗教的道士們，自然地契合一起，共做此項活動。

作者研究此項問題，先後曾寫有「蒙古漢軍與漢文活動研究」，「元代漢文化活動」，「元代道教之發展」專書與有關論文。此文即擷述要義，分作三部分：(一) 北方漢軍大將的保種存文，(二) 蒙古汗庭儒學人物的傳衍儒學，(三) 新道教的建立和對漢文化的貢獻，撮要評述。

*A Lecture on the Efforts of the Han People to Preserve
Their Race and Culture under the Yuan Dynasty*

by Sun Keh-kuan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13th century, the Mongols rapidly conquered China and the West, and millions and millions fell victims of the enormous empire that had its origin in a small tribe around Lake Baikal. Under the menace of complete desuruction of their race and culture, the Han Chinese decided to try various measures of survival. Most noticeably, the surrendered soldiers and intellectuals joined with the Taoists in their common efforts of acieving the goal.

As a continuation to the writer's study on the Han activities under the Yuan dynasty, the present, originally prepared for a lecture to be delivered at Yongsei University, Seoul, Korea, is divided into three parts: 1, the efforts made by the Han generals in the North; 2, Confucian scholars in the court of the Mongols; and 3, the emergence of a new Taoism, with its contribution to Chinese culture.